

自古迄北宋时期

# 浙江医药史

ZIGUQIBEISONGSHI

ZHEJIANGYIYAOSI

朱德明 著



中医古籍出版社



# 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医药史

朱德明 著

中医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医药史/朱德明著. -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5152 - 0271 - 6

I. ①自… II. ①朱… III. ①中国医药学 - 医学史 - 浙江省 - 先秦时代 ~ 北宋 IV. ①R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6341 号

## 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医药史

朱德明 著

---

责任编辑 郑 蓉

封面设计 陈 娟

出版发行 中医古籍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100700)

印 刷 北京金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9. 875

字 数 180 千字 彩插 10 页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 册

ISBN 978 - 7 - 5152 - 0271 - 6

定 价 25.00 元

## 作者简介

朱德明，1957年4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医史文献学、医药文化、历史学研究。现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兼任中华医学史学会医史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委员。自1990年以来，先后出版了7部学术专著：《浙江医药史》（29.1万字）、《浙江医药文物及遗址图谱》（30万字）、《杭州医药文化》（32万字）、《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21.2万字）、《元明清时期浙江医药的变迁》（45万字）、《浙江医药曲折历程（1840~1949）》（33.6万字）、《民国时期浙江医药史》（30万字）；撰写了《人口学原理》（浙江大学教材）、《浙江历代医药著作》、《浙江中医药文化博览》、《钱塘医派》等著作的部分章节；主持了1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课题；在《中华医史杂志》、《宗教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杂志上发表80多篇学术论文，代表作品有《古代中国与非洲的医药交流》、《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略》、《上海公共租界食品检疫初探》、《略论清末官制改革的实质》等。



## 内容提要

本书共分 5 章：第一章先秦时期浙江医药学，第二章秦汉时期浙江医药学，第三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浙江医药学，第四章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浙江医药学，第五章北宋时期浙江医药学。

浙江医药从无到有，起源绵延。尤其楔入北宋，更是进入了辉煌时期，在中华中医药发展史上谱写了优美的乐章。本书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习俗等各种视角对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医药卫生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将其置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探究，彰显了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外部因素的互动机制。通过研究这一时期浙江医药卫生演变的历史共性与地域特色，有助于具体、生动地展示一个时代的特征和社会风貌。

## 绪 论

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区，降雨丰沛，气温适中，生物繁茂。追溯 8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就具有与中原地域文明相媲美的灿烂史前文明史，并形成江浙地域文化风格。此后，浙江医药从无到有，起源绵延，尤其楔入北宋，更是进入了辉煌时期，在中华民族医药发展史上谱写了优美的乐章。

近年，浙江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受到人们青睐，涉猎古代浙江科技史的论著频繁面世，一些通史、专门史嗜好阐述古代浙江科学技术概况。但尚存遗憾：一是对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科技史中的医药卫生资料缺少系统性的挖掘与整理，尤其是考古资料尚未从医药卫生的角度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二是对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医药卫生研究尚不均衡。三是对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医药卫生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稽探仍处起始阶段。虽说一些论著也旁及医药卫生的起源，但不是把它与社会关系当做一个独立的“问题”加以研究。四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缺少系统性的梳理与总结，此方面尚未觅到完整的相关著作。

面对上述困境，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1）从搜集、整理实物资料和相关考古学研究成果入手，结合文献资料，对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科学技术成就，作出较

全面的梳理。（2）以医药卫生的进展为主线，按照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对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医药起源的五大阶段，以及各阶段医药卫生与社会的关系，作出系统性的阐述。（3）我们将研究对象置于当时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综合而细致的考察，力图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描述这一时期浙江医药卫生的起源。我们拟从收集、整理和分析重要的研究史料入手，在研究中不断汇集各方面的资料，并结合实地考察，力求比较系统而全面地梳理这一时期浙江历史上比较重要的医药成就，完整地勾勒这一时期浙江医药卫生起源的全貌。同时，围绕影响较大的机构、人物、成就、活动等，开展一系列综合研究和案例研究。此外，还特别加强跨学科的研究，深入探讨医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机制，展示这一时期浙江医药的历程，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多的解释功能和启发意义。

尽管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医药研究还处于起源阶段，研究力度单薄，但回眸往事，一些医药卫生特征已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对浙江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1）历史悠久，且持续发展。以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浙江史前文明，足以与中原地域的文明相媲美。由此至北宋时期，浙江的医药文化发展虽然也呈现出阶段性，但就整体而言，一直稳步向前，并为北宋以后浙江医药的腾飞奠定了基础。（2）这一时期浙江医药原创因素丰富灿烂。（3）浙江医药的东南沿海地域特色鲜明。（4）浙江

医药的某些成就具有较强的全国影响。(5) 与国外的医药交流较为频繁。自跨湖桥文化伊始，浙江文化就打上了海洋文化的印记。从古越文化到吴越国文明，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地区都能找到浙江医药卫生技术传播的痕迹。尤其从唐朝开起，浙江人民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表现出令人崇敬的壮举，谱写了传统文化交流的绚烂篇章。

从现有资料看，先秦时期浙江医药文献匮乏，而考古文物相对丰富。跨湖桥文化（距今 8000 ~ 7000 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代表性遗址跨湖桥、下孙遗址）、河姆渡文化（距今 7000 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马家浜文化（距今 7000 ~ 5800 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代表性遗址吴家埠、张堰、荀山东麓、马家坟遗址、梅园里遗址、小古城和南湖遗址等）、崧泽文化（距今 5700 ~ 5300 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代表性遗址石马兜遗址）、良渚文化（距今 5300 ~ 4000 年，处于已经隐现国家雏形，迈入古国或邦国行列阶段，代表性遗址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文家山、塘山、姚家墩、卞家山遗址等）、老和山、水田畈遗址以及新近发现的上山遗址、小黄山遗址，已构筑起距今 8000 ~ 4000 年间浙江新石器时代的发展脉络。这些考古遗址、古墓葬和出土的文物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我们要以医疗卫生专业眼光去审视其中的一些珍贵文物，拿来我用。这一时期浙江人民已从事了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

芡实等药物化石和有益保健的干栏式结构建筑遗迹，人们运用简易的医疗机械治病，使用食品卫生工具簸箕，挖掘水井，墓葬尸体，出现《桐君采药录》，越王勾践重视人口发展和人民的疾苦以及形成了一系列端午节的卫生习俗，道家、儒家思想对中医学发展的深远影响，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先秦时期浙江医药起源的光辉历史。

尚说先秦以前浙江医药还仅局限于“考古医药文化”，那么秦汉时期浙江医药的灿烂已初见端倪。这一时期浙江产生了杰出思想家王充及其著作《论衡》、专门论述养生之道的道教大师魏伯阳及其著作《周易参同契》以及葛子训曾在会稽都亭桥（今绍兴一带）骑驴卖药等医药趣事。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科技文化的发展一度可与北方发达地区相媲美，医药卫生的嬗递亦是如此。浙江籍医药学人才辈出，医药事业成绩斐然，民间医药卫生习俗初步形成。究其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491年肖子良在湖州府第北面建成了我国第一家私立慈善医院。浙江籍医药学家在正史中所占的比例居全国前列，出现了在全国极有影视的姚氏、徐氏等医学世家，开创了医学世家传授医术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二，重要的医药学著作多出自浙江籍或寓居浙江的医药学家手中，而且传统的医药学与文学、金石书画开始结缘，出现了嵇康、王羲之、谢灵运等一些文豪兼书画大师涉足中医药学，极大地丰富了浙江文化的内涵。其三，

佛、道、释家为浙江的医药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一宗派的创始人智𫖮在浙江天台山创立的被认作中国的首家派系的天台宗和全国四大佛教胜地之一的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借医弘佛。又如炼丹道家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药学家葛洪、陶弘景在浙江许多地方炼制丹药，寺院医药和炼丹术在浙江吐蕊结果，香飘大江南北。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浙江医药卫生的发展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地位，对祖国医药卫生的迈进做出了重大贡献。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唐朝浙江医官、医学生的设置，开启了设官建制管理浙江医药行业的先河。浙江出现了陈仕良、陈藏器等一些医药学家。浙江的中草药材十分丰富，产地较广，品种较多，吴越国朝贡北宋的香药品种繁多。在浙江出土的文物中有唐朝药店的黄釉研钵、瓷质唾壶、瓷质脉枕等医药卫生器皿。在杭嘉湖一带还有一些保健佳肴。这一时期，邻国的学问僧、医药学家来杭州学习中医药学，然后携宝回国推广的大有人在，杭州籍医药学家横渡海峡前往邻国传经送宝的比比皆是，海内外医药交流频繁。

北宋时期，浙江各州县设立了医学官制和惠民药局，掌管药物，为民治病。还出现了杭州第一所亦是当时中国为民服务的最大医院“安乐坊”。名医辈出，如裴宗元、沈括、朱肱、王执中等，他们在阐发中医药学术方面，真可谓千峦叠秀，百花争艳，宏富多彩。浙江人民饮食卫生光彩夺目，北宋城镇的一些石井，其修筑

坚固，清澈透底，博得历朝任官和文人墨客的赞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人文素质蓬勃向上和乡风习俗较为文明的状况，在中国饮食卫生史上留下了美好的一笔。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陶瓷琳琅满目、品种繁多、质地优雅、烧焙历史悠久，有关医药卫生的谚语生动形象，对外医药交流红火。

回眸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起源历程，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本著作的写作意义和价值在于：（1）通过对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医药史资料，尤其是对相关考古学材料的全面整理和挖掘，能使我们领悟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医药起源的整体梗概并梳理出一路走来的轨迹。（2）目前有关浙江地区自古迄北宋时期医药卫生的研究较少，而且非常零散。通过本书的研究，可以比较系统而全面地描绘这一时期浙江医药卫生起源的全貌。通过对这一时期浙江医药史各个阶段的专题性研究，可填补中国科技史、浙江科技史、中国医学史、浙江医学史、浙江通史、浙江社会发展史等领域研究中的空白。（3）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习俗等各种视角对这一时期浙江医药卫生起源进行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将医药卫生的起源与发展置于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究，可以彰显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外部因素的互动机制。通过研究这一时期浙江医药卫生风俗演变的历史共性与地域特色，势将有助于具体、生动地展示一个时代的特征和社会风貌，揭示浙江社会逐渐迈向现代化之路的轨迹。（4）针对这一时期一些医药卫生核心、

重要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可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一些薄弱环节。从医药的视角，可以挖掘浙江中医药文化底蕴和原创精神。通过深入考察这一时期医药卫生起源的某些特点和浙江地域文化的联系，可以凸显浙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并揭示出浙江科技文化的一些特质，可为当今中医药创新与社会发展提供历史诠释，从而为推动当代浙江的科学传播工作和规划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为创建文化强省服务。

当然，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形态看，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相为连通，共成一体。中国传统文化是悠久的、灿烂的。从文明的曙光在东方大地上升起至今，中国传统的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化学以及诗歌、辞赋、绘画、雕塑、音乐等，与中医一起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殿堂。从哲学角度看，中医在其理论构建之初，便借助了传统的阴阳观、五行观、元气论，这可以从《黄帝内经》中找到大量的证据。从技术角度看，中药的种植不能不依靠传统的农业和地理知识，中药的制剂常常需要借助炼丹术——传统化学的成果，中医的运气学说自然离不开天文、历法乃至数学的支持，这也可以从历代典籍中找到大量的证据，这是中医可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原因之一。

从学术的表达方式看，中医借助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众多形式。现存中医古籍的文体有散文式，也有诗歌式和辞赋式。《三家医案合刻》中载录了清代薛生白

的一则医案：“骨小肉脆，定非松柏之姿；脉数经停，已现虚劳之候。先天既弱而水亏，壮火复识而金燥。岁气一周一损，岂容再损？秋风乍荐已伤，难免重伤。证具如前，药惟补北；非敢说梦，聊以解嘲。”这是典型的辞赋体。唐高宗时敕命修订本草，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具有药典性质的《新修本草》，这部书原本有彩绘药图，所谓“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可以想见其逼真与精美。这是中医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关联。宋代王惟一铸造针灸铜人，自然不能离开雕塑的技术。至于可供吟唱的汤头歌赋等，又与音乐关联。中医的语言表达，至今仍带有古代汉语的特征，文辞古雅，行文简练，讲究声律与修辞，具有东方文化特有的美感。尤其我今年主持校注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能力建设项目”中的3部中医药古籍《古今医诗》、《医宗宝镜》和《方氏脉症正宗》，体会深刻。所以，从文化形态角度看，中医吸收与承载了中国众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在“传统失落”的今天，这种吸收与承载更显珍贵。这是中医可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原因之二。

中医虽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其他形式具有基本一致的精神内核，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借助了其他的文化形式，但其本身却始终独立，强大而又系统。从医学角度看，中医具有唯一的价值，是一种不能被任何其他文化形态替代的医药学术，是一种与现代医学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这种唯一的价值决定了它不仅曾经在历史上呈

现过精彩，也一定会在人类未来的天际中折射光芒。中医的生命观、疾病观和诊疗理念与方法，对未来的医学模式产生影响。再者，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如阴阳观、五行观、元气论等，在中医园地里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些在现代人眼中已经变得陌生的传统思想，由于中医的运用而更加丰富、全面、深刻而系统。中医强调天人关系，提倡顺应自然，调和七情，葆精毓神，主张扶正祛邪，养生全德，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乃至价值取向，即使今天，仍具有相当的渗透力和说服力。第三，中医的本草学、方剂学、针灸学、制剂学等专门学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独立而具有特色的内容。所以，中医充实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延伸与光大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是中医可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原因之三。

除上述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外，中医与哲学、儒学、道教、佛教休戚相关。

其一，哲学与中医药学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推动中医药学理论的成型，中医药学的显著特点和优势是它的整体医学模式，在其理论和实践中充分体现了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对疾病的认识和诊治充分注意到自然、心理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强调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强调平衡与发展。中医药学理论的成型，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实现。

其二，儒学与中医药学的关系：历史上诸多有造诣的儒医在其医疗活动中，探索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宇

宇宙万物的求知态度和理性精神，说明儒家文化并非仅仅关注于人际关系，而轻视或桎梏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而服务于整个社会的中医药文化，深深得益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思维依据，同时也奠定了伦理规范，医儒同道。

其三，道教与中医药学的关系：道教是中国人创造的一门宗教，具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宋金以后道教又分丹鼎清修的北派与符录斋醮的南派，前者又称炼养派，可分为紫阳派的南宗与全真道的北宗，后者又称符录科教派，下分龙虎、阁皂、茅山3宗。道教对中医药学影响巨大。

道教思想来源于老庄，尊老子为宗师，故《老子》、《庄子》被推崇为道教典籍，道教丛书自唐以来称为藏，《道藏》与中医药学关系密切。

《道藏》与中医药学关系：据初步统计《道藏》中有医书和内、外丹专著共150多种，涉及医药和养生著作达900多种，约70%的道教著作均与医学有关。

《老子》与中医药学的关系：老子创立了道家学说，成为一代宗师，其著作《老子》中的许多思想对《内经》影响巨大。《老子》主张的修身养性，清心守静至今仍深深影响中医药养生文化。

道教活动如道功、道法与中医药学的关系：道功的目的是养生延年，保全性命。道功主要有内丹、导引

(形体修炼)、服食、房中等几个方面，其中以前两者影响最大，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内丹盛于金元时期，内丹是相对外丹而言，以自身的精、气、神三宝为内炼药物，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在体内形成能按一定经络循行状如鸡卵的有自我感觉的丹。形体修炼包括导引、按摩、屈伸等，导引又称功力，为有意念参与可配胎息的动作，通过动作练习达到健身的目的，没有意念约束。按摩则通过穴位经络手法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道家的形体修炼法深得人心，现代广为流传的太极拳、五禽戏、干梳头等为群众保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食物修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外丹，二为辟谷食气。房中之术先秦已有记载，宋以前广为流传，宋以后渐流于荒淫，被人们不齿。道家房中术提倡节欲、养身等，旨在双方保健，很有养生价值。

道法有清虚无为、抱神以养、养命修性、炼养三宝、内守三一、存漱五芽、十三虚无、九守、坐忘等，属精神修炼范围，对养生起到较积极的作用，如道家强调的“养命修性、恬淡虚无”已成为中医药养生的一部分。

道家思想非常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清静无为”。在长期的实践中，道教汲取了春秋以前民间流传的宣导养生术的精华，创立了一套顺乎自然的气功养生法，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封建统治者追求长寿，偏崇道学，在当时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不少中上层社会人士纷纷效仿，以致于玄学思潮风靡于世。道家的思想

也深刻影响了中医药学的发展，在当时的社会，许多道士又是著名的医药学家、养生家，如葛洪、陶弘景都是医生兼道士的典型人物。由于道学追求长生不老，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因此道教盛行，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之药，服金石以求长生不老之道的风气炽盛一时。

随着道家思想的发展和日益完善，许多著名医家接受了道家思想，并且同时也接受到佛、儒的熏陶。秦汉以降，随着西方佛学的传入，到隋唐而成佛、儒、道三教鼎立，互相渗透。而当时的术士（业医人），如汉代的张仲景、唐代的孙思邈等，博采众长，划时代地使中医药更向前发展一步。尤其是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为中医药第二大经典，是中医药临床学的奠基石，它将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创立了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原则，以及六经辨证纲领。

因此，中医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其中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中医药学的影响最为深远，尤其是道家思想中的宇宙观、养生观和方法论，与中医药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四，佛教与中医药学的关系：佛教认为病苦是八苦之一，他们汲取古印度治病“四诀”，即善知病、知病源、知对治、知治方，来解释人间的病苦。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相信生死轮回，行善者成善，行恶者成恶。这些反映到医德规范上，就是著名的孙思邈《千金要